

青马在线

以历史唯物主义看如何“铭记历史”

□陈思

在抗战胜利80周年之际,相关题材影视作品多部上映,再次引发人们对“铭记历史”的讨论。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铭记历史”并非简单罗列往事,也不是沉浸于悲情,更不是宣扬仇恨,而是要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将抗日战争置于中国社会矛盾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全局中审视,从中汲取具有启示意义的历史智慧与精神力量。

人性微光,照亮沉痛的历史

铭记历史,首先要明白“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历史不是少数人书写的,而是由千千万万普通人的选择、付出与行动共同铸就的。每一个在战争中挣扎、牺牲、顽强抵抗的个体,他们的生命与选择,都不应只是宏大历史的附庸,而本身就具有重量。电影《南京照相馆》正是通过一个普通人、一个家庭、一群市民的命运,折射出那段沉痛而壮阔的岁月。它真实呈现了普通人在极端环境下的恐惧、悲痛,也刻画了他们从未熄灭的爱与希望。这些真实的人性微光,拉近了观众与历史的距离,让人不禁自问:“如果是我,我会怎么做?”

抗战叙事讲述平民故事,正体现了“人民主体性”。这段历史属于我们的共同记忆,镜头聚焦普通人的悲欢,让民族创伤变得可感、可触、可共鸣,也让年轻一代更容易理解并认同。平民视角以更广阔的视野,拓展了“人民英雄”的深意。

人民,既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也是历史记忆的承载者和传递者。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历史讲述,也在打破西方长期主导的叙事垄断,让中国人民自己拿回讲述历史的权力与尊严。

看不见的战争:历史唯心主义如何操纵我们的过去?

在社交媒体时代,历史唯心主义的表现更加隐蔽,也更具欺骗性。正如《南京照相馆》导演申奥所言:“除了硝烟战场,还有一场看不见的战争——舆论、宣传与文化之战,至今仍未结束。”历史唯心主义往往靠煽动情绪,制造对立来吸引关注,导致严谨客观的历史叙述反而被忽视甚至淹没。我们必须保持清醒,主动辨别信息,才能在这场围绕历史记忆的“认知战”中站稳立场。

一方面,历史唯心主义常将严肃的历史反思污名为“宣扬仇恨”,煽动对“极端民族主义”的恐慌,进而压制正当的爱国情感与历史正义。比如,《南京照相馆》因揭露日军暴行,而被指责为“煽动仇恨”。这种将家国情怀污名化,将历史真相扭曲为“别有用心”的做法,必须引起警惕。

另一方面,历史唯心主义常将历史裁剪成主观的“情绪”或“工具”,用道德评判或政治需求替代客观事实,否定社会矛盾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忽视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和牺牲。它故意将历史事件剥离原有的社会经济条件和阶级结构,掩盖历史真相。抗日战争明明是一场反法西斯的正义斗争,是阶级与帝国主义矛盾的爆发,却有人借“人性”“和平”等抽象话语模糊其正义性与尖锐性。

尤其值得警惕的是,它还将铭记历史与倡导和平错误地对立起来,以“向前看”为名行历史虚无之实,不仅扭曲历史,也破坏国际互信。应当明确,真正的和平从来只能建立在历史的正确认知之上,而不是通过回避、淡化甚至美化侵略来换取。

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历史绝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只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将战争与和平、侵略与反侵略放在具体的社会经济背景、阶级结构和国际关系中去分析,我们才能真正理解:揭露侵略罪行,是为防止垄断资本再次将国内危机转嫁为对外战争;铭记历史,是为让人民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纪念胜利,是为坚定捍卫亿万人民用鲜血换来的和平秩序。

坚持唯物史观,要看到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也是中华民族从近代以来陷入深重危机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点。分析历史,不能止步于政治或道德层面,必须深入其背后的宏观时代。

坚持唯物史观,核心是回到人民主体。人民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中国军民伤亡3500多万人,付出巨大民族牺牲,顽强支撑起东方主战场,长期牵制并抗击了日本陆军主力,为战胜法西斯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抗战胜利的关键——这是先辈们用生命写就的结论。

铭记历史,归根到底是铭记历史规律、人民主体、深刻教训和精神力量,从而将对历史的敬畏转化为对现实的责任、对未来的担当。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牢记历史,是为了开创未来;不忘战争,是为了维护和平。”唯有以唯物史观照亮抗战记忆,防止历史被虚无和消费,才能将对战争的理性认知,凝聚成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动力。(作者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大思政课”不等于“大思政”

□刘鸿畅

近年来各地蓬勃开展“大思政课”的探索和创新,但也存在一种误区,即把“大思政课”与“大思政”混为一谈,有的因范围过于宽泛而失焦,有的因过于注重形式而忽略深度,这都值得思考。“大思政课”说到底还是“课”,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种创新形态,推进“大思政课”建设一方面要做强做大“思政课”,同时不能完全脱离“课程思政”“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等理念,需要我们全面准确把握。

准确把握“大思政课”的“大”

“大思政课”,是“大”在格局。思政课不是一般意义上专注于知识传授的课程,它是站在“国之大者”的高度专门开设的课程。一方面,思政课具有课程“大使命”。思政课肩负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重大任务,承载着立德树、铸魂育人的历史使命。另一方面,思政课具有历史“大视野”。做大、办好思政课,要放在两个大局、放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来看待,要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来对待,要讲好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和中华民族发展史,赋予思政课以世界视野与历史纵深,以鲜活生动的史实来说服人、感染人、引导人。

“大思政课”,是“大”在内容。思政课不是单纯、简单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而是涉及许许多多的知识,如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涉及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涉及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涉及世界史、国际共运史,涉及世情、国情、党情、民情等

等,内容应该贯通中西古今,既要讲授理论热点,更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要形成自主知识体系。

“大思政课”,是“大”在阵地。“大思政课”建设既要有空间的广度,也要有知识的厚度,更要有实践的宽度。“大思政课”之大,还体现为课堂的“大阵势”。一是校园课堂阵地,首先要重视固有的思政课堂阵地,增强思政建设与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同步推进的政治自觉,不断推进最新理论成果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二是社会课堂阵地。思政课要和人们的社会生活息息相关,充分挖掘校内外资源,拓展社会课堂的教学阵地,以人们的生产生活相联系的重大主题如中国式现代化、新质生产力、乡村振兴等开展教学实践。三是将实体课堂与仿真课堂、线上课堂与线下课堂有机结合,为学生提供沉浸式、交互式的学习体验,增强时代感、吸引力与实效性。

精心办好“大”的思政课

做大办好“大思政课”,要从资源、教师和方法三个维度展开。

一是汇聚“大思政课”的“大资源”。系统整合社会各领域的优质资源,形成支撑思政育人的资源池,重点从讲课资源和办课资源两方面发力,构建全域协同的资源供给体系。构建理论资源、人物资源、文化资源、数字资源四位一体的思政内容供给库,既要建立资源准入与淘汰标准,定期补充最新政策案例、社会热点素材,也要搭建全国性大思政资源云平台,实现跨区域、跨校际的资源一键调用与协作开发。夯实全域协同的条件保障网,形成以平台资源、协作资源、经费资源、技术资源为核心要素的办课资源供给体

系。构建实践基地矩阵,不断拓展育人场域;建立区域思政课联盟,开展校内跨部门协同合作,打破条块分割;利用大数据分析学生思想动态,智能推送个性化学习内容。

二是培育“大思政课”的“大先生”。办好“大思政课”关键在教师。要重视思政课的教师队伍,形成以高校专职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高校辅导员以及行业专家等构成的“大思政课”教师队伍梯队。“大思政课”教师要始终坚持育人者先育己的基本原则,以教育家精神引领“大思政课”教师不断提升自我的职业素养,成为具备政治高度、理论深度、情感温度和实践厚度的复合型教育家,努力做“经师”和“人师”的统一者。“大思政课”教师只有成为胸怀“国之大者”的大先生,才能带领学生深刻感受和正确认知世界和中国发展大势。

三是运用“大思政课”的“大方法”。“大思政课”的育人方法意味着要突破传统思政课的教育范式,打造多维协同的育人生态,实现理论与实践、课内与课外、线上与线下的深度融合。“大思政课”建设的方法论核心就是要打破边界、贴近现实以及激发主体性。要在教学方法上转换思维,以课题讨论、情景模拟、户外研学、社会实践等教学方法不断拓展拓宽课堂场域;要以课堂为抓手,在跨学科的协同中不断创新教学模式,围绕学生关心关注的热点问题进行深度理论回应,用中国故事回答时代之问;要让学生主动参与到“大思政课”之中,构建教师主动引导、多元主体参与、学生主导实践的新型“大思政课”模式,使学生从旁观听众变为参与者和创作者。

(作者为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研究员)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作风建设的启示

□周艳艳

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作风建设。1937年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全国代表会议,毛泽东正式提出了“作风”这一概念。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命题。随后,延安整风运动进一步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使理论和实际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优良作风在全党得到极大的普及和推广。1945年,党的七大正式确立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三大优良作风”。

延安时期是我们党作风建设形成发展的关键时期。今天,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延安时期党的作风建设为我们党标本兼治持之以恒推进作风建设提供了有益经验和启示。

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党的作风建设

解决作风问题是一场持久战、攻坚战。不正之风具有顽固性与反复性,稍一松懈就有可能死灰复燃。延安时期,党在极其艰苦复杂的条件下,始终将作风建设摆在突出位置,针对不同阶段暴露的问题,多部署、持续推进,通过“大兴调查研究”“延安整风”“大生产运动”等一系列重要举措与不正之风坚决斗争,以优良作风赢得民心。

立足当下,党的作风建设更应根据不同时期的矛盾特点,常抓常新、久久为功。新时代,党执政的历史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四大考验”“四种危险”等严峻挑战更加凸显,对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持续深化作风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必须常抓不懈、新征程上我们务必从关乎党的事业成败的高度认识作风建设的重要性,精准把握其特点与规律,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不断取得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新成效。

锤炼党员干部党性是作风建设的重要一环

党的作风是党组织思想和行为的外在表现,是党性的重要体现。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了党性这一概念,开始从党性高度认识作风建设,并在实践中将作风建设与党性锻炼相结合,视优良作风为党性的重要标志。1941年5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指出,忽视客观实际事物存在的主观主义“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同年7月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引导全党从党性高度审视并改进作风。

锤炼党员干部党性是作风建设的重要一环。作风问题本质上是党性问题。抓作风建设,就要返璞归真、固本培元,重点突出坚定理想信念、践行根本宗旨、加强道德修养。因此,必须将党性教育贯穿作风建设始终,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提高思想觉悟,在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中不断淬炼党性、砥砺作风。

党的作风建设要思想教育与制度约束同向发力

端正思想认识与注重纪律约束是延安时期加强作风建设的一大特点。“延安整风”等思想教育运动改造并端正了党员思想,筑牢了作风建设的思想根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等纪律要求则严格规范了党员行为,以刚性的制度规定和严格的制度执行整治不良作风。历史经验证明,党的作风建设需要思想教育与制度约束同向发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主观上说,主要原因是一些同志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问题没有解决好,对坚持‘两个务必’既没有端正思想认识,也没有打牢思想基础。从客观上说,主要原因是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方针在有些地方没有落到实处,在一些方面管党治党失之于宽、失之于松。”在新时代推进党的作风建设必须坚持以思想引领与制度规范同向发力,既要加强思想理论武装,持续深化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破除特权思想和特权行为;又要着力强化制度保障,出台并完善党内法规,健全监督执纪问责机制。唯有将二者有机统一、协同发力,才能凝聚思想引领与制度约束的强大合力,不断破解作风顽疾,确保党的作风建设落实见效、行稳致远。

党的作风建设要坚持推进风腐同查同治

不正之风与腐败问题同根同源、互为表里。不良风气侵蚀思想防线,极易成为腐败现象滋生的温床;而腐败行为一旦发生,又会进一步败坏党风政风,助长歪风邪气的蔓延。这种风腐交织、相互转化的危险,在延安时期便有案例。如黄克功因居功自傲、特权思想膨胀而作风腐化,最终堕落到枪杀革命同志的犯罪深渊;肖玉璧则从贪图享乐、消极懈怠开始,思想防线逐步失守,最终滑向贪污挪用公款的腐败泥潭。以此为戒,党不断整顿作风、打击贪腐,将不正之风与腐败问题一体治理,先后颁布多个文件严格规范作风、惩治腐败。1943年2月颁布的《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规定,要“坚持廉洁节约作风,严厉反对贪污腐败现象”。据统计,1937年至1941年共查处各类贪污案件235件,有效遏制了风腐问题发生。

这种对风腐同查同治的规律性认识,在新时代得到了深化发展。党中央立足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明确提出风腐同查同治的战略部署,紧盯“四风”问题隐形变异的动向,深挖腐败现象背后隐藏的作风根源。2025年3月,《关于在全党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的通知》要求“运用由风及腐案例加强警示教育”,为当下推进风腐同查同治提供了有力指引。

(作者为湖北工业大学工程技术学院讲师、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

讲文明 树新风
长江日报公益广告